

张军华 著

影像 话语 文本

——叙事分析视野中电视新闻传播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军华 著

影像 话语 文本

——叙事分析视野中电视新闻传播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像 话语 文本——叙事分析视野中的电视新闻传播 / 张军华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648 - 0851 - 8

I. ①影… II. ①张… III. ①电视新闻—研究 IV. ①G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504 号

影像 话语 文本——叙事分析视野中的电视新闻传播

张军华 著

◇责任编辑: 颜李朝

◇责任校对: 胡亚兰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233 千字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0851 - 8

◇定价: 36.00 元

序

肖燕雄

军华兄的博士论文修改稿要正式出版了，邀我作序，我不胜惶恐。一般而言，为别人著作作序，是学界先进奖掖、提携、鼓励后学所为。而我与军华兄是同学关系，在中国传媒大学同窗共读三载，而且，无论是从学术修养还是从业界经历来说，他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硕士念的是文艺学，跟的是学界名师，钻研的是深奥的西方哲学、美学的学问；入学读博士之前，他作为一线业务骨干已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正因为这些经历和储备，曾记得在读博期间，我们常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之间转圈散步时，多是听他的侃侃而谈，其所谈内容让我们、至少让我，获益匪浅。

因此，我揣度，军华兄嘱我作序，并不是像通常那样的想从学界名宿笔下获得象征资源，而是基于以下两点：一是我们俩有相同的专业背景，硕士都是主修文艺学，博士都是学新闻学的；二是我们有相近的研究兴趣，我对新闻制度稍有研究，他对传播规范情有独衷。第一点意味着我对他写的东西还算看得懂。研究新闻的问题，我是把理论往浅白处摆，他则把理论往深处钻，而深钻西方叙事学理论并非所有的新闻学者都能入其堂奥。第二点则暗含了军华兄希望我俩就同一个话题进行切磋的祈愿，以期能在各自研究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彼此支持，从而就某些重要的理论话题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读硕士时主攻当代西方文论，对于西方的叙事学理论略知一二，也曾尝试过用它研究新闻作品，也想拓展其研究空间。但做得不能令自己、更不能令别人满意。我一直苦恼于找不到原因。读完军华兄的大作后，也深感受到其启发良多。诚如军华兄所言，我国以往的新闻叙事学研究有两个重要毛病：一是做一种新闻（符号）话语分析，分析过程缺少与新闻传播实践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二是从形式结构策略的层面上展开媒介文本叙事分析，而不对语言叙述机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和研究。也正因为此，对于日趋复杂的新闻传播实践而言，新闻叙事研究显然还存

在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首先，叙事分析方法并不是可以直接从文学搬运到新闻中来的。它必须经过一系列有机辩证的修正之后，才能运用到新闻叙事研究的分析论证过程中去。因为文学与新闻的本质区别在于虚构与纪实的区别。正是文学的虚构性才导致叙事学中的诸多技巧的运用。其次，运用叙事分析方法研究新闻时往往存在“六经注我”、各取所需的运思路径，导致肢解叙事学的结果。再次，西方叙事学是一种高度技术化、形式化的理论，而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是一种高度“在地化”、“本土化”的实践行为，这就有了天然的矛盾，解决好这一矛盾实为不易。

我个人认为，军华兄的大作对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困境花费了不少工夫，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也初步取得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对当代新闻传播研究而言，如何运用叙事分析方法切入其中，应当成为一个既占据着基础性地位，又富有关键性意义的研究过程。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叙事分析方法虽然以形式（故事）结构规律研究而著称于世，但是，它并不仅仅是一门关于故事结构规律研究的应用性学问，不单单是让大家学会去讲述一个有吸引力的媒介故事，而是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出其更深层次的运作过程特征，并由此破译新闻传播活动蕴含着的神秘而曲折的叙事文化逻辑。

希望读者诸君循此三条思路阅读该书，找寻其中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方法，看是不是与我有相同的判断。

（肖燕雄，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理事。）

前言

在日常现实生活中，语言叙事乃是一种极为司空见惯的社会文化现象，因为人们只要开口说话或者进行表达，就必然会涉及某种特定的叙述情境。但是，这种司空见惯并不等于简单透明的代名词，相反，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为人类的语言叙事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言不尽意”甚至是“意在象外”。所以，语言叙事现象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深切关注的重要讨论话题。到20世纪中叶，经典叙事理论的崛起使人们对语言叙事问题的关注达到了顶峰。尽管这种叙事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负面问题，然而，它对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深刻影响无疑是有目共睹的。也正基于此，本书所讨论的重心就是如何将叙事分析方法运用于新闻传播研究的相关问题。

总体来讲，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叙事（学）理论陆续引入到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人们一般称之为新闻叙事（学）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它大体包括两个层面的研究内容：一个是新闻（故事）叙述技巧研究，它主要是运用叙事（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讨论如何去讲述一个富有审美感染力的新闻故事；另一个则是新闻话语（符号学）分析，它通常把新闻话语视作一种特定的语言符号现象，着重分析其表层结构方式与内在意义生成的相关问题。应当承认，对当代新闻传播发展而言，这两个层面研究的积极意义无疑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两种层面研究的局限性也应当是有目共睹的，也正因为其局限性的存在，从而使新闻叙事研究在后续发展中始终裹足不前。在我看来，叙事（学）理论要真正为当代新闻传播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必须首先根据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要求，对叙事（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辩证的修正，并将前述的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研究有机地贯通起来，进而使之真正上升到一种语言学分析视角的方法论层面上来。

可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新闻传播活动既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同时，它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差异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实践活动，因而与人类语言表达过程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密切联系。从其内在规律要求而言，新闻传播

活动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运作的语言学过程，即客观信息的传递和主体意见的表达。其中，前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的起点和基础，它以传播真实性为基本要求；后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延伸和归依，它以传播公正性为价值依托。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传播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叙事和反叙事的，因为传播真实性要求人们妥善地运用各种语言符号，尽可能地实现语言现实与客观现实的相一致和相符合。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传播真实性的保障都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困难程度，因而在传播实践中只能作为某种基本理论预设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传播活动又必然表征为一种叙述性的语言方式，并总是会受到语言叙事活动规律的内在制约；以传播真实性为基本要求的新闻报道（语言现实），通常都被转化成为一个个富有戏剧性的新闻故事形式。

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故事并不等同于文学故事，它从根本上还是必须受到传播真实性要求的制约。在文学故事叙述中，故事情节结构往往是通过叙述时空塑形的过程来完成的，其时空塑形过程一般服从于审美效果机制的内在要求。与虚构性文学故事叙述不同，新闻故事叙述总是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定和制约，主要体现在其叙述时空塑形过程的自由度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在日常传播实践中，新闻传播的意见表达必须“以事实说话”而不能凭空议论，传播主体在意见表达过程中的能动性程度也得到了削弱。可见，其传播公正性与传播真实性也存在着某种内在密切的关联，其意义生成过程特征也显然不同于虚构性的文学故事叙述。也正基于此，新闻传播活动蕴含着一整套比较特殊的叙事逻辑，其分析过程路径也必然会呈现出一系列差异性结构特征。

当前，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闻传播活动不仅呈现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其运作逻辑规律逐步变得越来越神秘、曲折和复杂。因此，如何理解和阐释新闻传播活动的相关问题，也就更加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又相当的困难。本书分为七章内容展开整个分析论证的过程，第一章属于对叙事（学）理论发展的介绍和梳理，第二、三、四、五、六章属于本书分析论证过程框架的主体内容，第七章属于一种概括性和提升性的分析论证过程。它旨在以现有学术理论成果为基础，力争提炼出一个较为合理和相对完善的分析研究框架，并把它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语言学分析视角，以期能与当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其他分析视角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交流和互动。应当相信，这种学术努力不仅是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的，而且也并不是一种毫无可行性而言的玄言空谈。

编者

2012年6月

目 录

绪论	(001)
第一章 叙事分析方法的历史发展与理论脉络	(005)
第一节 叙事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理论家	(005)
第二节 叙事分析方法的考察对象与学理逻辑	(018)
第二章 作为一种语言叙事方式的电视新闻传播	(029)
第一节 作为历史主义叙事方式的电视新闻传播	(029)
第二节 作为一种视听叙事方式的电视新闻传播	(041)
第三章 叙述者：电视新闻传播中的言说主体	(052)
第一节 叙述者的一般特征与其他相关问题	(053)
第二节 电视新闻：叙述者的特征及其特殊讲话模式	(059)
第三节 电视新闻：多种叙述主体共存与其特殊叙述话语模式	(069)
第四章 叙事塑形：电视新闻传播的媒介转换	(078)
第一节 电视新闻传播的时空塑形特征	(079)
第二节 媒介叙事塑形的价值结构及其文化功能	(088)
第三节 电视专题类节目的时空塑形及其结构特征	(099)
第五章 叙事文本：电视新闻传播的媒介表征	(108)
第一节 电视新闻文本的故事结构特征	(110)
第二节 电视新闻文本的话语结构特征	(124)
第三节 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与其媒介叙事特征	(136)

第六章 叙事接受：电视新闻传播的价值实现	(145)
第一节 传播接受：理解阐释过程与叙事解码方式	(146)
第二节 电视传播接受与主体间双向互动	(157)
第七章 媒介叙事分析：新闻传播研究的语言学视角	(164)
第一节 当代新闻传播的主导性研究视域及其存在问题	(165)
第二节 新闻叙事研究的学理逻辑与其理论价值	(171)
第三节 叙事分析视野中新闻传播活动的运作逻辑	(178)
结束语	(185)
参考文献	(187)
后记	(198)

绪 论

在当代人类社会中,以新闻传播为核心的大众媒介传播活动,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类活动。之所以说其重要,是因为它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不仅是多层面和全方位的,而且是非常持久和深远的。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本身并不是简单透明的,它总是无声无息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我们在很多时候却不自知。实际上我们仍然并不清楚,是什么神秘曲折的物化机制,使之具有一种如此神奇的魔力。为此,自新闻传播活动诞生伊始,人们就始终未停歇过对它孜孜不倦的分析和研究;而随着当代新闻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研究也变得更加细致和深入。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正按照由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实务构成的总体框架不断地延伸拓展。同时,随着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被大量地引进,并富有成效地运用到新闻传播研究活动之中,各种相关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地涌现出来。但是,从学理上讲,任何一种理论运思方法都只可能从一个维度、一个方面去考察和分析事物(对象)的特征,给我们认识和理解打开一扇窗口、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也正基于此,从媒介叙事分析的角度切入当代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就应当成为一个有必要深入讨论的理论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富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实践课题。

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论证和叙事(述)是人类语言交往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前者的运作通常表征为三段论的逻辑—科学模式,它主要是寻求事物间的普遍真实性条件;后者则是一种“故事化”的陈述再现模式,它着重是寻求事物之间的特殊联系。^①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只要运用语言(符号)的中介来实现,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两种基本方式。当然,根据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性质不同,其运用的语言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相对来讲,前者大量应用在(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后者则广泛运用在人类的日常表意实践之中。就新闻传播活动而

^①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言，其语言表述方式主要是一种“故事化”的叙事（述）形态，而并不是一种逻辑—科学的论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深刻性也正取决于其叙述行为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因此，所谓新闻叙事研究就是人们运用西方叙事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语言叙事（述）机制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术实践活动。它着重考察其语言叙事（述）机制的结构形态、运作方式特征等，深入探讨语言叙事（述）机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是说，它主要以人们的语言表述活动为考察对象，着重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微观结构特征和运作过程机制。就其学术逻辑而言，它总体属于一种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范畴，而不是纯粹应用性的传播实务研究；同时，它由于始终与当代传播实践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又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理论分析的层面上，并对日常传播实践产生出显著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闻叙事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第一，语言（媒介）叙事现象大量地存在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并对当前传播实践发展产生了一种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作为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载体，语言（媒介）以其自身存在的某些特殊性质，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和重要意义。为此，维特根斯坦深沉地诉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海德格尔更是极而言之，“语言是存在的家”。而F·詹姆逊则宿命般地感叹，我们始终生活在“语言的牢房”中。可以说，在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对语言叙述问题倾注了极高的热情。这应当不是人们的一种热衷时尚的弄潮之举，也并不是一种纯粹自恋式的故作多情。实际上，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开始，语言叙述机制的问题就始终困扰着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在西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甚至是更早，并在进入20世纪以后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我国古代的先贤们也早已经发现语言叙述机制的复杂性，并留下了许多诸如“言不尽意”或是“境生象外”的格言。因此，在当代新闻传播发展中，如何深入分析和研究其中的语言叙述机制问题，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具有十分必要和非常显著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从传播学术逻辑上讲，新闻传播研究大致可分为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层面，这两个研究层面总是相互补充、彼此支撑和辩证统一的。前者主要是分析讨论新闻传播活动的自身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后者则着重研究新闻传播如何应用于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结构特征和运行规律。只有清楚事物存在方式的特征及其规律，然后，我们才能更好地把它运用于实践活动中去。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于多种多样的

原因,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风向急转,从本体研究迅速转入到应用研究上。^①这样一来,人们尚未弄清楚新闻传播活动的很多基本问题,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又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给新闻传播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沉重而严峻的挑战。其实毋庸置疑,当代新闻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的积极进展,但是,与日新月异、活力四射的传播实践相比,早已经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疲惫之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切入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有可能从当前发展的困境中打开一道缺口,找到一条帮助我们有效突破困境的发展路径,进而与当前新闻传播研究的其他理论发展进路,形成一种结构性的相互补充、彼此支撑的结构关系,并由此有力地推动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研究方法论上,新闻叙事研究属于多学科辩证分析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我们将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修养,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作为总体方法论和分析视角,贯穿于新闻叙事研究的整个分析和论证过程。同时,我们将大胆借鉴当代人文社科理论的最新成果,诸如西方叙事学理论、符号学理论、哲学解释学理论等,深入认识和理解其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模式,在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和整合的基础上加以有效吸收和充分利用。此外,我们还将紧密结合当前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现状,使理论分析和论证过程真正做到目标明确进而有的放矢,进一步提高新闻叙事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阐释力,而不至于陷入某种理论空谈的怪圈中而无法摆脱出来。

首先,作为一种跨学科综合研究,能否深入理解其理论逻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对本论著的研究来讲,它将是直接关系到新闻叙事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在所借鉴的各种方法中,西方经典叙事理论关于语言叙述机制问题的讨论,是迄今为止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本论著将以它作为整个分析研究的基本理论参照系。同时,我们将把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既从总体上准确把握其理论方法的总体框架,又从细部上深入理解其基本观点及其论证过程。毕竟,基于这种理论方法自身存在的某些局限,它虽然从总体上是比较合理和有效的,但是,在不少细部层面上还需要加以辩证的修正。也正基于此,本论著并不是把叙事理论方法整体移植到新闻传播研究中来,而是通过对新闻叙事研究进行相应的学理定位,根据新闻传播活动发展的自身特性和基本规律,对经典叙事理论的方法进行辩证的修正和改造,以期能提高理论分析方法的现

①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实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而克服在跨学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生搬硬套和简单化的弊端。

其次，新闻叙事研究既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思辨，也不是一种纯粹的传播实证分析，而是理论思辨与实证分析的辩证统一。它分析和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当前新闻传播实践之中。它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语言叙述机制为考察的对象，主要表征为一种理论思辨的过程，其中也包含着诸多新闻个案的分析过程。当然，我们并不是为分析某些个案而实证地分析它们，新闻个案分析服从于新闻叙事研究的整体逻辑结构。同时，新闻叙事研究也是在多个层面上全方位展开的，它是一种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和辩证分析。其考察和分析并不以某种方法为唯一的参照系，而是借助于多种理论方法的通力合作和彼此支撑。它既以经典叙事理论为总体方法论，并应用于分析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还包括像符号学理论、哲学解释学、比较分析和心理分析等，它们可能只应用于新闻叙事研究的某些层面上。从其总体结构特征来说，新闻叙事研究将总体借鉴经典叙事理论的分析方法，以其他多种分析方法为辅助性的理论视角，全面审视和观察新闻传播活动的总体过程，以期通过多种学科方法的有机融合，使新闻叙事研究既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演绎，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现象描述，并使之真正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总地说来，本论著以电视新闻叙事为具体考察对象，深入讨论新闻传播活动中语言叙述机制的问题。与以往的新闻叙事研究相比，它不是零碎的、印象式的媒介叙事分析，而是试图以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框架，全面深入地讨论电视新闻叙事的问题；同时，它并不是为了叙事（技巧层面）而研究电视新闻叙事，而是通过分析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语言叙述机制，着重讨论它是如何借助故事化的结构过程，从而生产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意义内涵。

第一章 叙事分析方法的历史发展与理论脉络

近年来，我们亲眼看到叙事研究领域里出现了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经过这些年的积极发展，一门“叙事学”实际上已经裂变为多家“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吸纳了大量新方法论和研究假设，并且重新思考经典叙事学的潜在思想，重新评估它们的（理论）适用范围。

（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1999）

可以说，人们之所以如此深切关注叙事的相关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叙事的存在。作为人类语言交往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人们借助叙事将其人生经验碎片组织成为整体性的、有意义的事件。按照杰罗姆·布鲁内（1986年）的观点，人类的认知活动包括两个基本的、普遍的行为模式，一个表征为叙事推理模式，另一个则是逻辑—科学模式。两种模式都是形成意义的“理性”方式。其中，前者是寻求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其解释推理包含在上下文之中；后者是寻求事件之间的普遍真实性条件，其解释推理则是自时间与空间事件中推断而来。但是，关于叙事现象研究真正成为—种独立而完备的学术理论体系，应当始于1969年托多洛夫关于“叙事学”概念的正式提出，以及众多理论家后续围绕着这个议题所进行的在学术方面的努力。从此，以考察人类语言叙述机制为核心的叙事分析方法，也成为人们考察其社会实践活动相关问题的重要学术范式之一。

第一节 叙事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理论家

从其学术背景而言，西方叙事理论的产生与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中叶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这次“语言学转向”的声势浩大之巨，几乎使人类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都投入到其中。从其具体构成来讲，西方叙事学理论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来源于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俄国形式主义

文艺理论和英美现代小说理论。一般来讲，人们把叙事理论发展总体性划分为经典叙事理论和后经典叙事理论两个阶段，其中，前者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的叙事理论发展，后者则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叙事学小规模复兴”及其后续发展。Daniel R. Schwarz 则将它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前结构主义（pre-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①在不同发展阶段中，不同的理论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学术视角出发，对语言叙事现象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也体现出西方叙事理论各个发展时期的结构特点与内在脉络。

一、前结构主义的英美小说理论

作为三个主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英美小说理论对促进西方叙事理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英美小说叙事理论》一书中，申丹教授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对传统英美小说理论、现代英美小说理论和后经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其中，在前结构主义时期，叙事理论发展主要得益于传统英美小说理论和现代英美小说理论的大力支持。^②

在18世纪英美小说理论中，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和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早期代表人物。阿芙拉·贝恩通过尝试运用18世纪普遍流行的三种基本叙述形式，开始意识到叙述视角对叙事效果的影响，主要是叙述人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和叙述位置（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所产生的不同叙事效果。威廉·康格里夫的小说观念则深受西方戏剧理论的影响，并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借鉴戏剧理论探索小说艺术结构问题以及叙述位置变化带来的叙事效果差异等等。随后，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其小说创作中探索了现代主义方法的美学特征以及诸多重要的叙述原则；玛丽·戴维斯（Mary Davis）则探索了小说创作如何通过紧紧抓住读者而展开叙事活动的过程，以及故事与情节的结构关系等问题。到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出现，英美小说理论对叙事问题的讨论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理查逊着重关注了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观点，如何增强小说叙事的复杂性，以及调节小说叙事的节奏和张力；同时，他坚持书信体，拒绝讲述体，并强调只有这种形式可以保证戏剧性叙述的生动有

① 程锡麟：《叙事理论概述》，载《外语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本章节英美小说叙事理论发展梳理以《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申丹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重要参照。

效。但是，与理查逊相反，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却摒弃书信体，坚持借鉴“散文体喜剧史诗”，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积极探索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相关问题，为后来的叙事理论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此后，托比亚·斯莱莱特（Tobias Smollett）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了讽刺喜剧的表现手法，并强调它视为小说叙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他强调在一个复杂的小说叙事中，统领故事的中心人物既是连接和贯穿情节的关键，也对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产生出重要的影响。劳恩思·斯泰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说创作在叙述手法上用不断的离题插曲打乱了传统的线性叙述规范，同时，他对人物心理活动描写的关注通常被视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理论的滥觞。

进入19世纪初期，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是其时英国最重要的小说理论家之一，他关于小说叙事的主要观点大多体现在《英国小说家传》中。在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传统的梳理中，司各特高度评价了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对小说《汤姆·琼斯》表现出来的整体艺术，以及其情节特征对读者的吸引力推崇备至；同时，通过对理查逊《格兰迪逊》的批判，司各特清楚地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叙事观，冲突和悬念不仅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推动小说情节（叙事）发展的内在动力之源。在分析哥特小说的叙事特点后，司各特提出了三条独到的见解，一是对诗意描写的肯定，二是对强烈情感的重视，三是对超自然写法的包容。他进而指出，作家的诗人气质既关涉到作品能否充满想象力和强烈情感，同时还是能否对读者产生强烈吸引力的关键要素。在与司各特同时代中，简·奥斯汀（Jane Austen）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不及司各特的成就，但是，也对英国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一方面，她强调小说创作应当从文体和叙事上重视简繁取舍的问题，同时，小说叙事应当呈现出自然合理的风格和特点；另一方面，奥斯汀还十分重视小说结构的整体性和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她认为，小说创作突然无缘无故地改变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不但是不符合自然情理的，也是小说叙述艺术所不能允许发生的情形。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理查逊书信体小说创作的逐步衰落，由菲尔丁所创的叙述体小说创作得到了极大发展，英国小说创作从此进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繁荣高峰，涌现出了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特罗洛普和乔治·艾略特等一大批杰出小说家。在这个发展时期中，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模式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创作的标准常规”。一方面，由菲尔丁开创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模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崇，并大量地出现

在狄更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的创作中。另一方面，人们对菲尔丁开创的全知叙述模式也进行了批判性的接纳和吸收。比如说，菲尔丁热衷插入式离题故事的小说叙事方式就引起了众多争议，并最终被逐出了“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创作的标准常规”；不少小说家还反对在小说叙事中进行侃侃而谈的做法，认为这种介入性的评论会直接损害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真实性。

随着小说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以情节曲折有趣为特征的“好故事”，并以此作为小说叙事应当遵循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基于当时分期出版给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人们开始注意到作家应当根据读者的阅读需求而调整小说叙事的结构方式。但是，分期出版给小说创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分期出版往往会使小说创作的连续性中断，从而造成了小说结构的整体性缺失。为此，哈代提出好的故事应当呈现出一个“有机体”结构的观点，即，一个“好故事”不但要有一个好的开头，而且每一期都还必须精彩的冲突和高潮，还要有一个自然合理的结构。也就是说，一个“好故事”既要在结构上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又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使读者期盼下一期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随着“好故事”到“有机体”的不断发展，从而造成了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创作的情节剧特征，其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成为詹姆斯戏剧性表现的叙事理论之源。在这一发展时期中，亨利·刘易斯关于小说叙事的观点也是值得人们重视的，它对艾略特走上小说创作之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学成功要略》系列论文中，他特别重视叙述精练的要求；同时，他还通过强调叙述连贯律的观点，主张小说叙事的节奏美与情节结构中高潮和变化的一致性要求。

进入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小说创作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当维多利亚小说以现实主义思潮为主流形态时，美国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以爱伦·坡（Allan Poe）、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为代表的传奇小说，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美国小说叙事理论不同于英国小说叙事理论。其中，爱伦·坡虽然主要以小说创作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他从1835年开始发表文学批评的文章，并首次使美国文学批评在欧洲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他认为小说的主要目的是给读者以感情上的冲击，并试图找出小说叙事何以产生最强烈效果的内在规律。他强调小说以引起读者强烈恐惧效果为宗旨，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哥特传奇小说诗意叙事特点的深刻影响。霍桑则明确把自己的小说作品称之为“传奇”，并对“传奇”与“小说”的叙事特征进行了相对明